

# 讀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 《傅斯年遺札》

區志堅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很多學者已指出書信為研究近現代史的重要史料，研究信函可知私人思想、感情及生活世界，人際網絡，更因書信記錄時人的觀察及感受，成為了解一個時代公、私領域的重要材料。（註1）近日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共三冊的《傅斯年遺札》（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100年）（以下簡稱《遺札》），既具史料的價值，擴闊讀者了解傅斯年與海內外學人及政界的交往情況，也因傅斯年曾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文、史系系主任，中央研究院（簡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所長，國立臺灣大學校長（簡稱臺大）等要職，史語所的成立、發展自與傅氏的規劃有關，先生的身份重要，其思想及事功，關繫一代學風的建立，及一代學人關懷的課題。故《遺札》既成為研究為研究「集學術、組織、鑑賞力及霸氣於一身」的傅斯年之個人生活史及思想史的重要依據，傅氏

為民國建立專業學術體系及一代學風付出努力的資料，（註2）更見奉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代表的傅斯年，怎樣在政風、學風的互動關係下，要「保持言論自由」又要「能以做官『行其道』」；要「愛國」又要「自由」；要建立學術制度，又要尊重知識份子的學術獨立，這種涉及思想、理念、實踐，與政治文化的內在緊張關係，看似矛盾衝突，實是各方面力量互相圓融，由是《遺札》不獨是研究斯年個人面對的問題，也是探討近現代中國知識份子所遇情景的甚佳材料。

《遺札》收集的信件自1918至1950年共1,286封函件，多為近年中國大陸出版《傅斯年全集》所未錄。此書除了收錄1987年傅氏夫人俞大綵捐給史語所私人檔案內斯年發出的信函，中研院史語所公文檔，和近史所朱家驊檔案內傅函之手稿、草稿及繕本，編者更把以上稿本資料整理成排印本，以便閱讀。書中也收錄羅家倫女兒羅久芳收藏的書信，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多篇傅氏致朋友的電報及信函；更有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羅久芳、羅久蓉編校《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等，有關傅斯年給朋友的信函，《遺札》保存傅氏資料的價值功不可沒。眾所周知，信函為私人文件，往往字跡潦草，尤以信函為手稿及草稿，更多未易校閱。編者以書函不同的版本互校，若取自檔案資料，多在每一函件下，註明所屬檔案的原始編號，信而有證，方便其他研究者查檢。而且，傅斯年喜在書信用

通假字、慣用字及兩字交相互用，編者「一例照舊，不出校」，但為方便讀者校閱，故在《遺札·編輯凡例》加以說明，當然信函中明顯的錯字及衍文，為求在正文內保存原文的真貌之下，便在正文的註腳列出正字及漏字，也在正文內加括號，以助說明。又編者也在信函中直接複製作者手繪圖畫，和保留書函中的附錄，如1929年2月9日〈傅斯年、余又蓀、姜立夫致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既刊載〈附一：遷臺兩所第一次談話會紀錄〉及〈附二：墊發二月份薪俸數目清單〉，其下加「編按：表一及表二內之金額原以國字書寫，今改為阿拉伯數字」，以便今天讀者了解經費收支的情況。又在1938年6月20日〈致胡適〉，保存了傅氏自繪戰時日軍直逼平漢路線圖，以便身在美國的胡適了解國內戰況。深信《遺札》的編例，將成為日後編刊文集的典範。

不少學者談及整理近人信札，每苦於國人寫信不寫發出年月日，甚至在公家檔案內繫年月日也不完備，考證每一信函的發出年月，甚為困難。編者以資料，重新考訂檔案內各函件的日期，並加繫年，按信函發出的先後為全書編次，有助讀者了解各自獨立的信函之互相關係及信函發出的時代背景。如檔案內〈致李濟、董作賓〉，原函沒有列明年月，經編者考核為「1932年5月15日」。又如抄件中〈致楊銓〉，下款只有「十一月廿二日，彰德」，經編者考訂此函發出的日期為「1932年11月22日」。

編者也考證函件內稱號的字號、暱稱

及謔稱，全書更附有書信關係人名稱對照表，收信方及書信編號索引，方便檢閱。如1919年6月27日〈致段錫朋、許德珩、陳劍脩、黃日葵〉，編者在原函中只書寫「袁次長」，此註下便清楚列出「編按：袁希濤（1866-1930），又名鶴齡，字觀瀾，時任教育部次長」，此函只書「旦期一，斯年上午約溫代校長赴廳保四同學」，註下書「編按：溫宗禹，原任北京大學工科學長，時代理北京大學校長」。全書考析文獻的苦心及辛勞，正如編者所言：「在玩拼圖遊戲，其中的甘苦，非親歷其事者不能了解」，（註3）實為公論。

《遺札》一書，當然為研究傅斯年生活史及思想史，提供不少有待開發的研究課題，更補足了不少民國史料和史事。

先看《遺札》補充民國學人史事的地方。一：《遺札》補足戰時拯救滯港文化人的史事。現時中共多書寫戰時只有中共才是營救滯居香港文化人的主要力量，（註4）但《遺札》提供另一方面的思考角度。1941年12月10日〈致陳寅恪〉電稿中，已說出：「陳寅恪：已電杭及異甫助兄速飛渝」（頁1188）；同日，傅氏更電函杭立武說：「務盼設法助陳寅兄來渝。電復宜賓李莊」；翌日，再致電報給王敬禮，問及「渝、港電報通否？請電復」（頁1189），已知傅氏十分關注籌劃拯救居港的陳寅恪一事。1942年1月11日的函件中，傅氏再次頓促國民政府，加快營救留港的寅恪及中研院各位同事：「物理所人員家屬甚

多，……此外有寅恪一家，又評議員中有何淬廉兄及陳煥鏞兄。其中異甫一所之各人，可謂因公住港。弟意，如果有方法派人一探，事屬可行也。設如向特務機關接洽得幹員，操廣東話音，熟于省、港、澳事者，先去廣州灣，再轉澳門，或可到廣州而入香港，先通一聲息，定一內入之法，其眷屬只好赴滬，或者有所裨益」（頁1196）。既見傅氏對營救滯港文化人之事，心急如焚，也見傅氏細心規劃慮營救路線及方法之苦心。

二：此書保存了宋史專家鄧廣銘的史事。現時出版及研究鄧氏的論文，和鄧氏自述文字，多談及鄧氏治學受斯年啟導，卻少談及鄧廣銘在抗戰前的個人生活。1942年1月15日〈致朱家驊〉，表述傅氏舉薦鄧氏給朱家驊任考試院或組織部的工作一事：「鄧廣銘君，山東人，北大廿三、四左右畢業。彼在畢業以前曾在山東黨務工作若干年，故大學畢業時，已逾三十矣。此君天資聰穎，學力亦有根底，所治為史學，……其長兄為共產黨所殺，聞即以鄧君曾在山東辦過黨之故，其弟又在濟寧戰役中陣亡，彼之小家在北平，大家在泰安，即憤共產黨，又以此間接洽向北平互兌款，故頗思改業，往重慶服務，……此君甚聰穎，能做文章，史學根柢甚佳，又曾辦過黨務，如此之人，亦不易尋也」（頁1198），特別談及鄧氏與國民黨關係，以「辦過黨務」指稱廣銘，列出廣銘長兄因參與國民黨的事務為共黨所殺，弟也是在濟寧戰役中戰死，故家人「憤

共產黨」，希望身為考試委員的家驊，給予廣銘工作的機會。傅斯年更在 1942 年 2 月 19 日再致函家驊，稱美「鄧廣銘君為長才積學之賢士，曾以推薦于左右，荷承復書，隨時留意」（頁 1231），極力向朱氏引介鄧氏才華。另外，依鄧廣銘的女兒可因回憶文字，既未談及鄧廣銘之兄死因，只說：「他的四弟鄧廣鎮於 1925 年考入濟南的山東第一師範，次年加入共產黨。1934 年冬廣鎮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爸爸從北平趕到濟南營救，……抗日戰爭爆發後，廣鎮擔任八路軍的干部，於 1939 年在一次行軍途中，在山東太和鎮遭國民黨部隊襲，被俘後英勇犧牲，時年 29 歲。爸爸失去四弟，自是十分悲痛」，（註 5）可因既不談共黨殺鄧廣銘之兄及家人「憤共產黨」之事，反而述及國民黨殺鄧廣銘之弟，究竟鄧氏兄弟與國、共兩黨的關係是怎樣？兄弟被殺有沒有影響鄧廣銘的思想？傅氏此函為研究國共相爭下，知識份子的抉擇，提供有待進一步研究之處。

三：現時研究 1949 年前後中研院發展，多注意中研院院長朱家驊的籌劃，其實細閱《遺札》傅氏與友人、政府官員的信函，已知傅氏對 1949 年前後中研院發展，甚有貢獻，尤對史語所的規劃，更是居功至偉！

清末民初的學者多認為，中國建立系統傳授知識的方法，以科學方法及提出新觀點研究學問，使中國學術走向學院化、系統化、科學化及專業化的發展，才是救國的良

方，以傅斯年在 1928 年發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所言，這種新學術的成果是「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其實早在留學歐洲時的斯年，已注意建立新學術的重要，1920 年 8 月 1 日〈致胡適〉，已說俞平伯未留學之前，治學是屬於「中國文先生的毒」，如今要「輸入新知」，便要「多讀西書」，但其時留學生多「求速效，急名利，忽忘學業，……我很希望北京大學裏造成真研究學問的風氣」（頁 17），新學術是學習西書，學人也要接受專業學術的培訓。同年 9 月，傅氏〈致蔡元培〉談及英國與中國學風相較，「北大此刻之講學風氣，從嚴格上說去，仍是議論的風氣，而非講學的風氣。大學供給輿論者頗多，而供給學術者頗少。……大學之精神雖振作，而科學之成就不厚。這樣的精神發作之後，若沒有一種學術上的供獻接著，則其去文化增進上猶遠。近代歐美之第一流大學，皆根植基於科學上，其專植根於文藝哲學者乃是中世紀之學院。……願先生此後於北大科學之教授法與學者對於科學之興趣上，加以注意。……諸位太偏重國外的方面，太輕視國內方面了。恐怕國內若能與國外共進，或者與國外方面也有絕大之助力，否則國外方面想終成無根的泡影」（頁 22），希望北大學風走上科學及專業學術發展，也希望依中國本土的情況，才引用西方理論及方法，最終希望使中國學術與西學研究方法「共進」。既然新學術對國家發展甚為重要，學術發展有賴建立專業學



術研究機構，多從事學術培訓的工作，傅斯年於1928年4月〈呈大學院〉函，就是建議成立「中央研究院固亦應設一研究語言學及歷史學之機關，按之中國情形，方之歐洲通例」，以西方學術機構為範本，建立史語所的規模，院所也要設立圖書收藏的地方，研究員必「屬於中央之研究所聘請之人不任中大教務者，自然由此研究所任之」，並要求「屬於中央之研究所，每月提出獎勵金千餘元至二千元之譜，分給在此研究所之刊物上及中大之研究所兩種刊物上著論文者，此項獎勵金之分配」，為研究員提供足夠的經濟資助，研究員自可安心從事學術研究，至於研究工作「大別為個人的及集眾的兩類」（頁123），「集眾」的工作，要求人員合作進行人類學調查及徵集民俗材料等，也要求研究人員定期出版研究成果，並把研究成果刊在所出版的刊物，如《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集刊》等，並要舉辦展覽，讓公眾人士了解研究成果。

既然傅氏一生志業所在是成立中研院及其史語所，《遺札》也記錄傅斯年在不同階段的史語所及中研院之發展，付出的心力。先看二十年代末及三十年代初，傅斯年為中研院發展付出的努力。1928年4月30日〈傅斯年、顧頡剛、楊振聲呈大學院〉，1928年5月5日〈傅斯年、顧頡剛、楊振聲致蔡元培、楊銓〉，1928年11月7日〈致楊銓〉及1929年1月6日〈致蔡元培、楊銓〉等函，均談及傅氏為中研院史語所籌備處，設計章程及定立聘請研究員

的制度，其中有「若中央研究院感覺到人材之難得與難致，且目前之財力有限，則暫以此廣州之建置為發軔之試驗，六月之後有可觀者，然後由中央研究院為之擴大，如此，似乎目前開始容易，步次穩當，蓋即以廣州之已有者為憑藉，不特一面維持了一個較有意義之建置，且一面比較平地建設者為方便，此意與中央研究院承認此建置名義上改屬中央並稍加資助之一種辦法亦稍有不同」（頁117），又規定研究員的薪金及獎勵金，又注意購置海內外圖書和報刊，他說購買文獻的重要是：「我等建設此研究所之目的，本想開闢幾條研究的新途徑，故不能不廣備西洋研究中國學問有大貢獻之著作及報」（頁122），又擬出聘請海內外學者的名單。

史語所成立之初，聘請的研究員，多為傅斯年所籌策。1928年6月6日〈呈中央研究院〉說：「查前中山大學預科國文教授董作賓君年少績學，天資學力俱茂，……董君著文亦多創見，如其商正王靜安君《唐韻》之作，即可見從學之方術。謹按河南古物至多且要，歷史語言研究所必于彼工作，以成弁事，擬請大學院聘之為研究員，以定所業而利進行，並擬請大學院核准每月給予津貼百元，俾抒衣食之累而專研究之功」（頁140），董作賓因此聘為研究員，並希望政府多給補貼，使學人安心立業。

傅氏深明李濟主持安陽殷墟發掘為中國古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他多次致函楊杏佛，代為向政府申請資助進行安陽調查及發掘

的工作。面對三十年代初國家經濟困難，傅斯年也因應情勢，建議削減開支，如 1931 年 11 月 21 日〈致楊銓〉便說：「院經費支絀，弟等早料到。不幸今春拖下之書帳，及蠶壇之修理等，致欠院萬七千元。此等情形，即總辦事處不言，吾等獨不自感不安乎？自上月中旬起，書籍等事，均實已停止。……若並每三月領兩月經費亦辦不到，可于兩個月後縮小範圍。例如弟可去翻書，移去薪水之半等等。只求維持幾位專位研究員之薪水，及必要助員、職員之薪水，而犧牲其他」（頁 381），為維持各研究院的經費，主動自求減薪。

日本於 1931 及 32 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及一二八淞滬之戰後，傅斯年已決定史語所移離北平，其後抗戰期間籌劃中研院及史語所經費及搬置物資，均成於傅氏之手。傅氏多次致函教育部長朱家驊談及「兄言英庚款可支一大數建設博物院，弟迫不獲已，擬請先撥一小數，約十來萬之數，即在北極閣上建築之，作為本所考古、史料、民俗，等事之陳列館，即為將來大博物院人文部之籌備處」（頁 451）。乃至中研院搬至昆明，傅氏又多次致函中英庚款的董事會成員，希望多撥款資助研究員往海外考察，和協助把漢簡自昆明運往香港大學，力言：「木簡不可運滇，惟原物近朽，馬尼刺天氣似不宜。運美最佳。但無論何地，均須裝好，方可不毀」（頁 1085），親自籌策運送文物的路線，及細心地關注載運物品的木箱設計。

抗戰八年，史語所由南京遷四川，期間

物資及人事的安排，均由傅氏規劃。1940 年 9 月，傅氏感到史語所營運的困難，再致函朱家驊，不獨要求資助史語所，更廣及中研院各所：「算來算去，史語所遷去及開張至少非五十萬不可，否則東西運得不足用，此五十萬可出乎？若無此數，本所以後情形，乃不堪問。……想及本院之嚴重處境，在滇各所，雖不能全搬，要須搬其大半，否則一旦出事，本院不僅殘破且凋零矣。此中詳計之數，已見前函。若實行此計，非百二十萬不為功，若兄勉力達到此事，則中央研究院得其延續，並功偉矣，否則以後大難辦也」（頁 1125）。

再看四十年代中，傅氏規劃中研院發展的辛勞。其時患高血壓的傅氏，在病中仍籌劃中研院「戰後重建」的問題。1942 年 2 月〈致朱家驊〉中，談及大病初愈：「因賤軀初覺好轉，擬于今年格外小心，……可研究戰後重建之方案，戰後重建，則一面與各大學如何關繫，一面與各技術建設機關如何關係，皆是應考慮入之重大問題，而學院之立場，與應用之要求，如何調劑，亦須大費斟酌」（頁 1234）。

戰後，中國一地的大學出現學潮，傅氏也為平復此事而勞心。1945 年 12 月 9 日，致電報朱家驊；於 12 月 10 日，致電報蔣介石；12 月 11 日至 16 日，再致電報朱家驊，而於 12 月 13 日一天之內，先後電報兩函給朱氏，以上各函既談及平復學潮，並在上款中首書「萬急」、「政密」等，可知傅氏極急於平復學潮的心情，函中曾建議「李

宗黃如能即去，教授心意可平」、「目下可謂已將萬鈞壓力加于罷課者，然明日各教授上課，學生必不能上課。校當局與教授必紛紛辭職，下一步之辦法，最好為聯大提前結束，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提前恢復」（頁1662），校員必歡迎此處理方法，傅氏不同意政府以「解散」聯大之名，處理此事。又致函董作賓，談及復員後，應多注意為研究人員安排住宅及多給經濟補助，解決「京滬物價，三倍于李莊」（頁1687）的問題。1949年1月，傅斯年任臺大校長，再發函朱家驊，明言因「台灣大學經費向不由中央撥發，偶有補助，為數甚少。……台灣生活高漲，教授收入不足買一石米，賓萬分艱苦，敬懇照六月份標準，加發一個月全薪，以利同人」（頁1869）。

傅氏死後，屈萬里曾發文稱讚傅斯年「他千方百計的來維持研究人員的生計，使他們能安心治學；他想盡辦法來給病人弄錢養病」，（註6）《遺札》也可引證此點。1940年2月12日〈致雲南全省衛生實驗處〉，已建議：「本院與資源委員會上列各機關發起在此地籌設衛生院，目下先開一診療所，一俟地方上出款時，將其併入為衛生院。此診療所之醫務，由上海醫學院主持，其醫生及看護亦由其派來。如有重病，便移往白龍潭醫院診治。此項薪水，由上海醫學院付」（頁1066）。

《遺札》的信函也可見傅氏甚為關心中研院各人的生計及健康問題。他對梁思永、梁思成兄弟及思成妻林徽因的救助，尤可

見傅斯年為同事生活而操心。1942年4月18日〈致朱家驊〉先說梁啟超家道清寒，其子思成及思永兄弟「困在地莊」，思成之因為「是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子TB，臥牀二年矣。思永是鬧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氣管炎，一查，肺病甚重」，二人自北京至四川「已弄得吃盡當光，又逢此等病，其勢不可終日」，力言啟超「雖曾為國民黨之敵人，然其人于中國新教育及青年之愛國思想上大有影響，啟明之作用，……亦可謂功在民國者也」（頁1247），希望身為國民黨要員的朱氏，可以放下黨派的觀念，予以救援；加之，思成是「研究中國建築，並世無匹」，思永是「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陽發掘，後來完全靠他」，二人「皆今日難得之賢士，亦皆國際知名之中國學人」（頁1247），希望朱氏「可贈以二、三萬元」。相距十日後，傅氏〈致朱家驊、葉企孫、王敬禮〉（1942年4月28日），再說及「思永之生病，敝所之最大打擊」，因為思永「雖非本所之組主任，但其 moral influence 甚大，本所考古組，及中央博物院之少年同志，皆奉之為領袖，……彼學力才質，皆敝所之第一流人」（頁1253），希望朱氏允許從醫務所撥數千元為思永買藥。

傅氏也極關心瞎眼後的陳寅恪之生計問題。1947年5月4日〈致陳寅恪〉已說：「目下政府規定，機關不能支兼任薪之加成數，學校則可支兼鐘點薪之加成數。如兄在本所支全薪及補助費，兄仍在清華支鐘點薪

及加成數。若反過來，則不能支本所兼薪之加成數，以審計部不許核銷也。……研究所有在戰時哈佛補助小款，今尚存若干，商之同人，以美元金百元助兄養病，此款俟有便帶上。……前兄云找一助理或書記，為兄查書。茲在北平方面留一名額，兄可找人相助」，發出此函前，傅氏已致函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建議：「惠允寅恪兄之薪由本年一月份起仍由敝院繼續支付，庶幾寅恪兄之收入，可以稍多，且寅恪兄決不因此而減少其在貴校之義務，亦不因此而增加其對本院之義務」（頁 1752-1753），處處為解決寅恪的生計考慮。

當然，《遺札》為日後研究傅斯年的思想史及生活史，提供了有待開發的領域。

其一，《遺札》得見傅氏赴歐洲留學前後，思想及行為上從「不知人情為何物」走向「以做官『行其道』」的歷程。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傅斯年正值 24 歲，尚未留學，此時的傅斯年性格剛烈，敢發言論，《遺札》內刊載的第一函是傅斯年於 1918 年 8 月 9 日〈致蔡元培〉，傅斯年仍是學生，竟向北大校長蔡元培致函，信中首句便說：「校長先生鈞鑒：月來學生對於吾校哲學門隸屬文科之制度，頗存懷疑之念，謹貢愚見於次」（頁 2），具有一般年青人激烈勇往直前的豪情壯語，質疑校方把文史哲合科的課程設計：「中國文學，歷來缺普及之性，獨以高典幽艱為當然，又以無科學家，而文士又慣以玄語蓋其淺陋，遂致文學與科學之關係，不可得見，反以哲學、文

學、史學三位一體焉。今為學制，宜祛此惑，不宜仍此弊也」，希望把哲學歸入理科，未明課程改革要按步就班，不能急促進行。又於 1919 年 6 月 27 日〈致段錫朋、許德珩、陳劍脩、黃日葵〉談及他人造謠誹議《新潮》後，便說：「弟等兩人平日素志，又斷無與政客接近之理。斯年以性情偏激之故，絕無入政界之力；又以年來學問之感化，認政治為萬惡之源，認世界之進於光明，全在政治之根本推翻。故早已宣言此後終身不入政治界，終身不脫教育界」，強調「終身不入」政界。

回國後的傅斯年，任職中研院，為了中研院的發展，曾致函教育部長朱家驊，其文辭為「驢先我兄大鑒：昨奉手書，敬悉一是。我兄為國百忙，其苦自可想像，然於此時會，亦只好格外努力耳。即弟所辦之事，其重要性比其兄所任者真九牛之一毛，然亦為此局面忙得昏天黑地」（1933 年 1 月 30），書函的後半部份是希望朱家驊「擬請自撥一小數，……即在北極閣上建築次，作為本所考古、史料、民俗等事之陳列館」，信函的佈局是先稱美朱氏為國家發展付出的努力，再以委婉含蓄的筆觸表述申請資助，自言這乃是「弟迫不獲已」才致函朱家驊。此時的傅斯年已任職官方籌辦的史語所所長，但在不改個人為籌辦中研院發展的心志下，與現實行政及與政府官員交往，此函的文字與未留學前的函件相較，已沒有昔日所言「斷無與政客接近之理」之「偏激」用語。又 1939 年，發生了行政院院長孫科，

欲把中研院古物運往蘇聯展覽，託任鴻雋請傅氏借出殷墟古物，傅氏給任氏的多封信件，已指出若把院藏物品自昆明運往蘇俄展覽，長途運輸及空襲，必然破壞古物，但「中國與蘇聯固應有增長交情，然其術不在古董，尤不在殷墟一類之古董。……蘇聯一切決於國家，此等物在此展覽中，不過湊熱鬧，毫無重要意義」；況且，是次展覽致破壞殷墟古物，必然是「犧牲一大部分最美之美品，十年工作，折于一旦」，既然「中央研究院之地位，本應接應政府之要求」，但自己感到「吾輩乃國家之公務員，非孫院長之牛馬，弟決不對之希意承指。若以此取罪，刀鋸斧鉞，所不敢辭。吾平生各不知結歡權貴」，考慮到戰時國民政府與蘇聯合力抗日，只好選一些尚沒有太大歷史價值的物品及發掘工作照片，送往展覽。這一決定，既可保持不仕權貴及保存古物的心志，又可協助國民政府推動中俄外交，和日後中研院發展為思考問題的要素，從中也得見斯年返國，任職中研院後，多從不同角度，考慮行政的事宜。

其二，傅氏為近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自然當之無愧，（註7）《遺札》得見這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怎樣藉參與政府行政，以保存及實踐個人的心志。1946年3月5日〈致俞大綏〉、3月27日〈致蔣介石〉及1947年2月4日〈致胡適〉等函，已表明傅斯年的理想，是「說我做官的話，是這樣的。謠言歸謠言，內容也有原因。中共向我說：『我們擁護你做教

育部長』，我說：『我要言論自由，向來罵人的，今不為人所罵。且我如果要自盡，更有較好的法子』。C.C.也有此一說！……我罵人慣的，一做官即為人罵，這是保持言論自由。做個『一品大員』，與那些下流同一起，實受拘束，這是行動自由。你放心，我不會沒出息做官去。我不是說做官沒出息，做官而不能辦事，乃沒出息。我如何能以做官『行其道』呢？」（頁1673），就是「做官『行其道』」，不是求名利而求官，而是為實踐自己的理想而出仕；他在致函拒絕蔣介石的委任，已見傅斯年實踐了「做官『行其道』」的理想，他說：「斯年實一愚戇之書生，世務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偶可為一介之用。蓋平日言語但求其自信，行跡復流于自適。在政府或可為政府招致困難，在社會偶可有報于國家也。……斯年亦曾屢屢公開言之，此非一旦在政府時所應取。然亦良心性情所不能制止，故絕非政府才也。……此後惟有整理舊業，亦偶憑心之所安，發抒所見于報紙，書生報國，如此而已」（頁1678）。他雖然參與中研院，仍不改其不直接參政府部門的心志，在1947年2月4日〈致胡適〉中，說明自己反共及不入黨，不入政府的心志：「一、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自玄學至人生觀，自理想至現實，無一同者。他們得勢，中國必亡于蘇聯。二、使中共不得勢，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進。三、……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

如辦報。……五、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久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評政府的地位」（頁 1743），寧願為在野的知識份子，以「良心性情」批評國民政府的施政。

那樣傅氏為何任職政府機構中研院史語所？從《遺札》中，已見傅氏實「以做官『行其道』」，前文已言傅氏藉任史語所所長，實踐了為中國建立專業學術機構的宏願，又為籌劃中研院及史語所發展所付出的努力；同時，也可見傅氏藉任職中研院，以實踐了自己憑「良心」從事，以達「書生報國」的心願。

此外，他已為史語所所長，未因任職官方機構，而改變其發表批評時政的言論，仍以「書生報國」的良心判斷是非，敢於批評官方施政之失。1937 年 10 月 11 日〈致胡適〉，已批評南京官僚施政的不當：「上海前敵兵士，真是再好也不能了。這次最可佩的是革命軍將士，最無聊的是南京官僚」（頁 827）。1938 年 7 月 12 日〈致蔣介石〉批評蔣氏委任孔祥熙當行政院院長之不當：「孔院長于國家大事只是枝節應付，並無政策。其用人則一由愛憎，罔分賢不肖。兼以行政院事權閣僚可辦者，亦握之於一手，遂致大僚有備位之感，事務鮮推行之效」、「自信望言之，孔院長實為國人所痛惡也」、「孔氏一家生活之奢侈，一門舉動之豪華，固不能不蒙物議」等（頁 905-908）。至 1950 年初，傅氏剛到臺灣，也致

函陳誠，力言「今日兄兼兩重職，院長及國防部，故副院長一職非同等閑；兼以兄之性格，有時忽其所不當忽，……檢昨日所談，兄之個人英雄主義，更為顯著。今日之事，個人不可不是英雄；然個人英雄主義，在今日鮮能濟事者矣。今日辦事，在乎能成一隊，能為複繁有功能之機器。內閣陣容，必然中外失望。昨今所聞已有『陳將軍與 CC 之聯合內閣』，……事實上為公一人之內閣矣」（頁 1871），希望陳誠知才力不及，辭任行政院副院長一職。

其三，不少學者已指出現實上的人生是充滿矛盾，在矛盾中堅定個人的志向，才是人性高尚的地方，《遺札》也保存了傅斯年的矛盾性格，最終以成就「生民」事業，為一生歸縮。1942 年 2 月 6 日〈致胡適〉已述戰時的傅斯年面對成就個人學問和為「生民」事功之間的抉擇，也見傅斯年又要面對喪母之痛，個人血壓已高，更在搬移過程中，左眼血管破了「一量血壓，打破一切紀錄！於是大吃藥，睡了兩週，又算差不多了。目前半工休息」，平日又要忙於策劃史語所搬運物資的事情，只好「拖」延診治高血壓的情況，終於休養，值此反省自己從事行政工作及學術之路上的決擇，他說：「因為多事，害了自己的事。我想若是這些年不管別人的事，我總寫成了幾部書，或者尚不至于這場大病也。病中想來，我之性格，雖有長有短，而實在是一個愛國之人，雖也不免好名，然比別人好名少多矣」，「只是凡過公家之事，每每過量熱心，此種熱心，確

出于至誠，而絕非有所為」，自感「心地十分淡泊，歡喜田園舒服」，自己「本以不滿于政治社會，又看不出好路線來之故，而思遁入學問，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門裏門外跑去跑來，至于咆哮，出也出不遠，進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無成也」，面對繁重工作，個人疾病及學術的事業，和成就他人事業的抉擇，感到身心疲累，一時泛起「拖著病而寫書，其樂無窮」，歸隱「田園」的感慨，終因「不能忘此生民」，為了藉建立史語所及中研院，以實踐為中國建立學術專業發展的宏願，只好出入於成就個人學術及建立「生民」事業之間。可見傅斯年如普通人一樣，面對生死疾病，沒完沒了的行政工作，遂反思過往行事，心情起伏不定，遂經一番反省後，更堅定了傅斯年選擇以生民立業為終身使命。

《遺札》也保留了傅氏面對壯志未成，自生感傷的文字。1948年11月6日〈致李田意〉函中，表述了傅斯年面對共軍戰勝東北，已發出與中共「勢不兩立」之言，但自己感到無力改變國軍節節敗退的事實，引為感傷，自言「眼前這個四千年的民族，要不免于一度為蘇聯征服——其慘比日本征服尤甚——心中不能釋然，而又毫無用力之處，所以心緒奇劣耳。我到今天方寫這封信，原故皆在這些情緒上。……目前中國的局面，早已料到，本必驚異，但身陷其境總是心煩。我回來時還很熱心，近則覺得實無處可以用力，這個感覺也不是現在才用的，二十年中常常覺得如此。所以，這個感覺也

不能固定，也許下星期又勢心起來」，並說自己已致函蔣介石和其他官員批評政府內政及外交的不善，國民政府滿是「扯濫污的委員」，「東北之垮台，是注定的，但表演如此壞，却不應該。其故由于大將貪，小將也搶，弄得兵如奴隸一樣」，錦州不守「主要失敗之原因在於『長春撤守，瀋陽出擊』應該早實行半年，彼時實行，當不至如此全軍覆沒」（頁1849），面對「國內之腐敗，令人一切寒心，而共黨又是滅亡中國的」，傅斯年雖未見1960年代中國大陸出現文化大革命，但已預知將發生的事情，可惜國民政府卻不接受自己的建議，只好「看書，編稿子，決不早跑，然也決不落在共黨之手」，泛起一種無可奈何及納悶的心情。

其四，不少學者已指出中國男性書寫的回憶錄及口述史，往往未多談及與家中妻兒的感情生活，（註8）《遺札》的信函，卻保存了傅氏對妻兒愛意的資料。〈致俞大綵〉（1946年3月5日）的附件中，載有〈傅斯年的十齡公子寫給他的一封信〉已言：「前幾天我生了一個疥癩，頸子腫得又粗又大，見了肉類的食物就想吐。……媽說我頸子腫得太大了，簡直和您一樣胖。我笑著說：『人家都是越病越瘦，而我反到越病越胖了』」，除了述及兒子玩水母的情景外，信函的最後一句為表述妻兒陪伴斯年往美國就醫情景：「我覺得我們家庭經濟已很困難了。我和媽可以不去，但爸爸的病是需要治好的，所以您一定得去，只要您的病好了，我和媽一切都肯捨棄」（頁1677）。



此函得見孩童樂天開朗的性格，也流露妻兒關懷父親的病情，信函中附上兒子的信件，也可知傅氏極珍惜這一段與妻兒交往的情懷。

其五，《遺札》保存了戰時流行疾病及傅氏一家的生活史的資料。1942年2月6日〈致胡適〉言及其母生前「還與小孩們玩，跳窗子看，每日做飯做衣，非此不樂！自離南京後，他即與舍弟一起，在重慶城郊全住。舍弟近年景況不差。……他的用度自然是我供給，但一家生活水準，大有關係。去年初，大家皆窮不了，我仍勉力供給他它人家肉食無缺。雙十節日前數日，生一次瘡疾，已好，雙十節仍為舍弟小兒作生日，樂甚。過雙十節瘡子又犯」（頁1204）。記錄了一幅戰時婆、孫生活的圖像，雖然生活在戰火之中，家中仍有肉食。然而，傅氏以「勉力」一詞指稱「供給」家人所需，已知傅氏感到維持家中各人的供養，不是一件容的事情。當然，此函也記錄戰時庸醫「誤斷」母親為「急性胃炎」，終至病死一事。

其六，從《遺札》可見傅氏對中共的態度。1937年1月20日〈致張蔭麟〉說：「弟個人思想論，早歲熱心社會主義，及見中國共產黨之行為，然後確信中國共產黨之只能壞事也。……中國共產黨之目的，此時仍不是抗日，而是借題侵入以償夙願。……弟與共產黨以前甚多來往，故自信認識不錯也。……弟以為中國必須聯俄，而絕不能容共……蓋聯俄須有本錢，此本錢即為有力量的國家組織，凡有此本錢而欲聯俄，俄自

願聯，雖清共，彼乃並不在乎，……所謂容共，往事失敗，弟曾身臨其境。今如任其武裝自若，必起極大之擾亂，而為日本乘之，故曰容共不能聯俄，因失其本錢也」（頁775），傅氏明白共黨推動聯國民黨抗日的�因及俄國只求擴張利益才支持中共，日後發生史事均可引證傅氏此言甚為正確，從函件中也見傅氏從國民黨及聯俄抗日的利益考慮，是贊成國民政府聯俄的；又從若共黨放棄武裝叛亂的觀點而言，是贊成「容共」的，但此函的最後部份，傅氏卻悲觀地說「若共黨真肯放棄其武裝叛亂，自當收容，然彼不必肯也」，肯定共黨不會放棄「叛亂」的策略，這樣也說明了斯氏「不能容共」的政治立場。

另一方面，《遺札》一書收錄了傅斯年致他人的信函，函中的附錄也有刊載他人的報告或函件，若日後重編此書，編者可以廣泛蒐集友人致傅斯年函札，編成名為《傅斯年書信集——與友人往來信札及函電》，既刊載傅氏致函，也有他人的回函，藉此得見友朋之間的交往及各人怎樣回應斯年的行事。同時，編者可以在每一信函前，撰寫簡介，說明發信的時代背景，增加讀者了解傅氏所處的歷史環境，又或可以在《遺札》內，附上「傅斯年生平大事年表」，以便讀者閱讀信函時，快捷地了解傅氏發函的時代情景。還有，若解決了版權的問題，可以在《遺札》內加上信函原件的照片，使讀者可知傅氏的筆跡，見字如見人。此外，讀者若要進一步了解傅氏與史語所的關係，可



參閱蘇同炳《手植楨楠已成蔭——傅斯年與中研院史語所》（臺北：學生書局，2012年）；欲宏觀研究傅斯年的生平，可以參閱 Fu Ssu-nien（王汎森），*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譯本：《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北京：三聯，2012年）和〈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2003年）。至於研究傅斯年政治思想的專著，可見馬亮寬《傅斯年社會政治活動與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相信閱讀《遺札》時，再閱讀以上研究成果，將有助了解傅氏向友朋致函的動機及時代背景。

總之，《遺札》的出版實現了胡適在〈傅孟真先生遺著序〉所言：「這裡最缺乏的是孟真一生同親屬朋友往來的通信。這一部選著，加上將來必須搜集保存的通信，——他給親屬朋友的、親屬朋友給他的，——就是這個天才最高、最可敬愛的人的全部傳記材料」；（註9）《遺札》內的信函，除了可見傅氏善於以信函及電報，指揮及調動資源外，也見斯年與中研院同人，努力建立專業學術機構的苦心及毅力，正如蘇同炳所言「傅斯年先生在抗戰期間為了維持史語所而支付了如此巨大的精神與心力，稱之為『傅斯年精神』，應該可以當之無愧」，對的《遺札》內信函，已呈現「傅斯年精神」感染著中研院各人，及一批近現代兢兢業業的學術人，為建立「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之努力！（註10）

#### 【註釋】

1. 見王爾敏，〈我在大學博士班開講「近代名人箋啟」〉，《新史學圈外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57-379。
2. 轉引自王汎森語，見氏，〈傅斯年與陳寅恪——介紹史語所收藏的一批書信〉，《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2003年），頁517。
3. 王汎森，〈序〉，《傅斯年遺札》，第1卷，頁ii。
4. 見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室編，《省港抗戰文化》（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共寶安縣委黨史辦公室編，《回顧東縱統戰工作》（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
5. 鄧廣銘，〈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鄧廣銘全集》，第1冊，頁302-307；頁308-326；鄧可因，〈永念不忘的親情——懷念爸爸鄧廣銘〉，張世休主編：《想念鄧廣銘》（北京：新世紀出版社，2012年），頁29。
6. 見蘇同炳，《手植楨楠已成蔭——傅斯年與中研院史語所》（臺北：學生書局，2012年），頁302。
7. 潘光哲，〈傅斯年與吳晗〉，布占祥、馬亮寬主編：《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340-341；馬亮寬，《傅斯年社會政治活動與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374-376。
8. 游鑑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口述史料中的性別形象〉，《她們的聲音：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55-218。
9. 見胡適，〈傅孟真先生遺著序〉，《胡適文集》，8，頁546-549。
10. 見《手植楨楠已成蔭——傅斯年與中研院史語所》，頁314。